清史研究前沿·八旗制度实践

编者按：八旗制度贯穿清代军事、政治、社会等各领域，是理解清朝兴衰及治理特点的重要线索，是清史研究的重要环节。本期前沿专栏刊发的三篇论文，均以清代八旗制度实践为核心，分别从军事防御、边疆治理、司法实践三个维度，呈现出八旗制度在清代国家治理中的多元功能，为理解其“军政一体”特征及历史局限性提供了实证支撑。

清代旅顺八旗水师考论

潘洪钢

［摘要］ 旅顺八旗水师是清代较早的海防水师，它产生于控扼渤海海峡咽喉的海疆防御需要，其名称常被误解为金州、旅顺两支水师。从兵员组成与八旗管理体制看，无疑属于旗籍水师。雍正初增兵之议、乾隆中裁减之议均被否决。乾隆十年和道光二十三年对营制进行了整改。它既负内海巡查之责，也担外洋巡哨之任，乃至跨境巡哨至朝鲜。它与天津、山东登州水师联动，构建环渤海防御体系，是清前期沿海防御及八旗海防体系的重要环节。八旗水师是八旗驻防向海疆的正常延伸。其兴衰反映了清代海防的演变，对研究清代八旗与海防意义重大。

[关键词] 清代　旅顺　旗营　八旗水师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26）－01－0001－013

旅顺八旗水师，是清代较早的海防水师。与性质上颇有争议的吉林、黑龙江等地的水师不同，它的八旗军队性质是肯定无疑的。自康熙晚期创建至光绪初年裁撤，历时160余年，既负内海巡查之责，也担外洋巡哨之任，在清代八旗序列的水师中颇具特色。

对旅顺八旗水师的研究，学界重视不够，成果不足。研讨清代海防、水师的学术论著，往往只讨论绿营水师。[①] 这当然受到学界一般研究取向影响，也是人们对八旗水师的作用与地位

［收稿日期］ 2025-02-12
［作者简介］ 潘洪钢（1960—　），男，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座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武汉 430062，panhg77@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清代八旗水师与海防研究”（23AMZ014）阶段性成果。

① 比较完整的研究清代水师的论著如王家俭：《清代绿营水师（1681—1864）》，李金强等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年；李其霖：《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师与战船》，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后于2014年由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以“见风转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师与战船”为名出版。

认识不足所致。具体研究一地一时水师的论文，偶有涉及，不遑深入，对八旗水师总体评价较低。[①] 就辽东半岛海防重镇旅顺的八旗水师而言，除了一些探讨东北区域水师如吉林、黑龙江水师的论著有所涉及外，针对性的专门研究较少。[②] 讨论相关时期或区域问题时涉及旅顺水师者不在少数，但鲜有对旅顺八旗水师的专门讨论。[③] 应当提到的是，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日本方面的一些论著，包括日军侵占旅顺期间的出版物，也涉及旅顺水师的历史。[④] 近年来也有一些硕士论文涉及旅顺八旗水师问题。[⑤] 改革开放后纂修的新方志，对旅顺八旗水师多有涉及，但多是基本情况的叙述，且相互重复者较多。[⑥] 本文拟梳理有关史事，以期推进清代旅顺八旗水师的研究。

一、旅顺水师名称及与金州水师关系

清入关后，辽东半岛成为“龙兴之地”的天然屏障。位居半岛南端的旅顺，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环抱渤海，背靠盛京、直隶，具有广阔的陆地纵深；外瞰黄海，远眺朝鲜半岛，扼守东北海疆之咽喉要地。长期任职于沿海地区的清人陈伦炯评价说：“登州与旅顺口，南北隔海对峙，东悬皮岛，西匝两京登莱，是为辽海。”[⑦] 从直隶的角度观察，“直隶全境，东滨大海，与奉天、山东接壤。海岸自登莱折而西至天津，又徙而东，迤逦至山海关，又渐北至锦州之东，复转而南至金州之旅顺口，而与登州相望，左右环抱，大海盘旋其中，古所谓渤海也”。[⑧] 故《清史稿》说：“东三省沿海各口岸，以金州、旅顺为尤要。”[⑨]

不仅作为战时防范外敌与海盗的海上天然屏障，和平时期，旅顺也是清政府调剂粮食盈缺赈济灾区的枢纽之一。例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盛京报告地方遭灾，户部议覆：“今山东运来之粮，现由金州等处海岸经过，请将所运粮米酌量截留，减价发卖。”[⑩] 这得到了批准。当直隶等地出现灾荒，即便是在严禁粮食随意流通的情况下，也会开禁，调剂盈缺。如乾隆八年（1743）因直隶等地发生旱灾，下令开放奉天相关港口，允许官民贩运粮食，后又屡次延展期限，直到乾隆十一年奉天遭遇洪灾才停止粮食输出。[⑪] 由此亦可理解清廷于此地设置八旗水师的目的所在。

旅顺八旗水师在历史上名称不一，甚至称呼混乱。文献中比较常见的有奉天水师、盛京水

---

① 潘洪钢：《清代八旗水师与海防体系》，《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20 年第 3 期。

②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江红春：《清代旅顺水师营初探》，《大连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张银龙：《清代旅顺水师营的创建——以陈尚义为中心》，《山西青年》2017 年第 6 期；王宏斌：《奉天府的内外洋与盛京水师巡洋制度》，《晋阳学刊》2020 年第 2 期。

③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傅克东：《八旗水师事略》，《满族研究》1986 年第 1 期；魏刚：《明及清前期的旅顺》，《大连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王刚：《清代绿营官兵编入八旗水师考析》，《清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张公政：《晚清东北海疆驻防体系变革考析》，《东北史地》2016 年第 2 期；王宏斌：《清代直隶内外洋划分与天津水师的四度兴废》，《河北学刊》2017 年第 6 期。

④ 井贯军二：《水师营史考》，目黑书店，1944 年；水岛吉隆：《图说满州帝国的战迹》，河出书房新社，2008 年。

⑤ 王惠：《清朝八旗水师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丁宁：《清代东北八旗水师研究》，长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关青云：《清代金州副都统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年。

⑥ 大连市旅顺口区史志办公室：《旅顺口区志》，大连出版社，1999 年；《大连通史》编纂委员会：《大连通史（古代卷）》，人民出版社，2007 年；旅顺口区水师营街道小南村修志委员会：《小南村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 年；水师营村志编纂委员会：《水师营村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 年；水师营街道志编委会：《水师营街道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 年。

⑦ 陈伦炯：《天下沿海形势录》，《皇朝经世文编》卷 83《兵政十四・海防上》。

⑧ 光绪《畿辅通志》卷 93《海防二》。

⑨《清史稿》卷 135《兵志六・水师》。

⑩《清圣祖实录》卷 162，康熙三十三年正月丙辰。

⑪ 民国《奉天通志》卷 32《大事三十二・清六・高宗一》。

师、锦州水师、熊岳水师、金州水师、旅顺水师或旅顺口水师等，情况较为复杂。

将旅顺水师称为奉天水师或盛京水师的情况比较好理解。东北地区为所谓“龙兴之地”，天命十年（1625），后金迁都于沈阳，后称为盛京。清入关后的一段时期，由八旗驻防长官行使管理职责。“盛京奉天府：天命十年，自辽阳迁都盛京。”“（顺治）十四年，设奉天府，罢辽阳府为辽阳县，属奉天府。”① 奉天将军或称盛京将军，为最高军政首长，旅顺八旗水师作为其属下军事单位，用奉天水师、盛京水师之名，概以地方相称，二者均为水师营上级指挥者，而辽东所在地方除旅顺水师，并无其他水师，一般不至因为使用这种较大地区称呼而产生理解上的歧异。如光绪时说“奉天旅顺口原有旗营，艇船朽坏”② 云云，一般不会有歧义。

将旅顺水师称为锦州水师，大约有两种情况。一是与地方归属有关。如《清实录》中提及旅顺水师设立的情况时即作是说。康熙五十二年八月“九卿等遵旨议覆，盛京锦州地方，设立水师营，于防守海洋，大有裨益”。③ 旅顺旗营水师及上级金州城，直到雍正时才由锦州分置熊岳副都统，归属该副都统管辖。（雍正五年）“夏六月，移盛京副都统一员于锦州，增设熊岳城副都统”。④ 同年十月，议定：“调奉天锦州副都统图尔赛为熊岳副都统。”⑤ 熊岳副都统一直是宁海县（后设金州城守尉）之旅顺的上级长官，所以康雍时期，史籍中也有旅顺曾隶属于锦州的说法。康熙五十年“管理奉天将军事务都统嵩祝疏言，奉天所属锦州铁山，离山东所属隍城岛，只半日程途”。⑥ 此时旅顺水师尚未设立，所以他建议山东水师跨过渤海海峡，巡哨到旅顺湾一侧的铁山。按文中原意，铁山距位于渤海海峡中部的隍城岛只有半日之途，系指旅顺水师所在地的铁山无疑。揆度原文，“奉天所属锦州铁山”与“山东所属隍城岛”上下对应，亦有铁山隶属锦州之意。

旅顺港地处渤海入口处，扼渤海海峡，向南与山东登州遥遥相望，沿海向西数百里可达锦州，习惯上也常常将这一带称为锦州沿海。“锦州府左控朝鲜，右引燕蓟，前俯沧溟，后控沙漠”，⑦ 一句“左控朝鲜”，即将锦州沿海直到旅顺外海全部囊括其中了。可知文献中将旅顺水师称为锦州水师亦属事出有因。

另一种解读是，实录等书中所载上述奉天将军嵩祝奏疏中的锦州，实为金州之误。⑧ 民国《奉天通志》中直接在上述嵩祝奏疏下注明：“按，铁山在金州，实录疑误。”⑨ 而《东华录》则直接写道：“奉天将军嵩祝言，奉天所属金州铁山距山东所属隍城岛仅半日程，请令山东防海水师官兵巡哨金州铁山，俾海边贼匪无所容身。”⑩ 也是将实录中的锦州直接写作金州，锦字与金字发音相通，亦可备一说。

事同一理，旅顺水师常常被称为熊岳水师，理由与锦州大体相同：一段时间中，熊岳副都统一直是水师的上级主管。

熊岳，为辽东重地，但清入关后直到康熙初仍为大片荒芜之地，隶奉天之盖州（后改盖县），康熙二年，“盛京户部侍郎吴玛护等遵旨议复，盖州熊岳地方，安插新民。查有附近荒地

---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2《盛京奉天府》。

② 《清史稿》卷135《兵志六·水师》。

③ 《清圣祖实录》卷256，康熙五十二年八月甲戌。

④ 民国《奉天通志》卷31《大事三十一·清五·世宗》。

⑤ 《清世宗实录》卷62，雍正五年十月癸巳。

⑥ 《清圣祖实录》卷245，康熙五十年二月戊寅。

⑦ 程晴川：《广舆古今钞》卷上，乾隆刻本，第25页。

⑧ 井贯军二：《水师营史考》，第82–83页。

⑨ 民国《奉天通志》卷30《大事三十·清四·圣祖下》。

⑩ 蒋良骐：《东华录》卷21，中华书局，1980年，第384页。

房基，酌量圈给。并令海城县督率劝垦”。① 起初熊岳的级别较低，“初，置城守章京。雍正五年移盛京副都统一员镇守，兼辖复州、宁海、岫岩、凤凰城等处”。② 始成辽东重镇，旅顺水师此时仍归于熊岳所属之宁海县（后改为金州），熊岳成为旅顺水师的直接上级。因而，乾隆时人们讨论旅顺水师情况时，直接指出：“熊岳所属旅顺海口，设水师营官兵，为奉天南面保障。”③ 乾隆十年以后定制，“熊岳副都统每年春季于二月初前往旅顺操演水师一次”，并对水师船只、器械及官兵技艺进行全面检查，“据实查明，行文奉天将军，每年奏明送部注册”。④ 如此，将旅顺八旗水师称为熊岳水师，为顺理成章之事。

最易混淆的是旅顺水师与金州水师的关系，《清史稿》“兵志”将旅顺八旗水师视为金州、旅顺两个水师营：“奉天旅顺口，于顺治初年设水师营，以山东赶缯船十艘隶之，始编营汛……金州水师营隶城守尉，水兵百人。”⑤ 同书“水师”和“海防”又有多种不同记载，既说设立于顺治初年，又说设于康熙时期；既说设立于旅顺口，又说同时有金州水师。混淆难辨。事实上，金州暨旅顺只有一支八旗水师，只是称呼不太一致。

首先，综合史籍所载，金州、旅顺地区只有一支旗营水师。金州为明代卫所之地，清初设巡检司，后长期设城守尉，为正三品武职，略高于从三品的旅顺水师协领，有监管旅顺水师之责，二者同属熊岳副都统管辖，直到鸦片战争时期，为加强海防才将熊岳副都统移驻金州，所以常常称金州、旅顺水师。雍正初“奉天将军噶尔弼疏言，旅顺口至凤凰城，水程几及千里，止有旅顺水师一营”。⑥ 从旅顺沿辽东半岛海岸向北，距离最近的便是金州湾，奏疏中直接说只有旅顺一支水师，可证金州旅顺水师实为一家。

追溯到明末清初，所谓金州旅顺水师，也是设于旅顺。“旅顺之设水师，盖自明万历三十年始。抚臣赵楫言，金、复、海、盖为全辽之心腹，复州参将、金州守备原为海防而设，惟黄骨岛、旅顺二卫海口设兵单弱。请以山东游击统水师千余，留驻旅顺。”⑦ 可见，明代留守的金州水师即驻旅顺。水师驻防于旅顺与其天然良港的优势相关，金州湾外向大洋，直迎海浪，而旅顺口为一个小港湾环抱，堪称避风良港。从海疆形势看，它地处辽东半岛南端，向南遥瞰山东登州，向北背靠金州，扼守渤海出海口，是水师屯驻优选之地。清人也多认为水师驻防旅顺符合兵家所谓的“护背之义”：“王雁汀制军庆云《渤海图说》，拟于隍城、石岛之间，驻水师将领一员，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内防盗匪，外慑夷人。与康熙朝嵩祝请登州水师巡哨金州铁山之说，颇足相辅，盖兵家护背之义也。”⑧ 此处的隍城、石岛、铁山就是旅顺水师驻地，旅顺旗营水师的基本巡哨方向就是南与山东登州水师对接，北经金州直达凤凰城与朝鲜接壤之地。康熙间建立金州水师时，投诚海盗头目陈尚义也曾向官方报告说：“且金州海口不能停船，易于损坏。”⑨ 也说明了金州旅顺水师停泊于旅顺港内的基本情况。

其次，从水师驻防与训练之地来看，也只有驻防旅顺港口的这一支水师。无论称为金州水师也好，称为旅顺旗营水师也罢，驻防于旅顺是肯定的。“旅顺水师营汉军协领一人，驻扎宁海

---

① 《清圣祖实录》卷 8，康熙二年正月壬午。

② 民国《奉天通志》卷 87《建置一·城堡·海城县》。

③ 《清高宗实录》卷 243，乾隆十年六月甲子。

④ 《内阁题本》，兵部尚书班第等，乾隆十年十二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下同），档案号：02-01-006-000736-0001。

⑤ 《清史稿》卷 135《兵志六·水师》。

⑥ 《清世宗实录》卷 47，雍正四年八月壬午。

⑦ 杨同桂辑：《沈故》卷 2，辽海书社，1931—1934 年，第 6 页。

⑧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 11，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49 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868 页。

县南旅顺城。”[①]“金州水师营，即旅顺水师营，汉军协领一人，驻劄宁海县南之旅顺城，属熊岳副都统。”[②]此处所说的宁海县，即金州卫所在地，清初卫所不存，设县管理，先后归海城县和熊岳城副都统管辖，军事上曾先后设巡检司、防守尉和城守尉。金州与旅顺同隶于一县，水师驻防于金州偏南、旅顺偏北之地，又常隶属于金州城守尉，所以文献中出现金州水师、旅顺水师并称的情况。

从水师训练水域来看，平时停泊在旅顺口内，一般性水操即于旅顺港湾内进行，遇有大型操练和检阅，即移至金州港外柳树屯进行。乾隆十年，奉天将军达尔当阿奏报：“臣于本年七月前往巡查海疆之时，将南金州旅顺口水师营官兵六号船只，令在柳树屯岔塘中操验……又有四号战船因值小修之年，俱在旅顺口停泊，臣亲往查验。”[③]康熙末年成立以来，长期配置教习官兵对水师进行训练，其水阵运船之法，也是在金州柳树屯进行。“设立水师营，蒙圣祖仁皇帝拣选闽省漳州镇总兵官标下中营游击陈祖训等五员，发往此处，教习之时，原在内洋柳树屯地方训练。雍正九年，世宗宪皇帝又特发广东参军、总兵官解希贤教习水师，以赎罪愆。该员于雍正十年亦在柳树屯内洋教以运船整伍之法。”[④]停泊于旅顺、训练于金州的作法长期沿袭，嘉庆间，盛京水师“其战船十只，以二只守口，其余船只，在于柳树屯地方操练”。[⑤]道光中，盛京将军耆英回顾旅顺水师的建立与训练时说：“查旅顺水师营，自康熙五十三年经固山贝子苏诺等奏请设立，其寻常水操，系在该口海面演习；遇大操，该口水浅，即在金州属柳树屯海口试演。”[⑥]这种驻扎于旅顺、操练在金州的情况，也是文献中出现两个名称并存的原因之一。

再者，从建立初期建造水师营房的记载来看，虽然名称不同，但建房数量是一致的，也说明仅有一家水师营。雍正间成书的《八旗通志初集》载，“金州水师营驻防，康熙五十四年，盛京工部修给官兵营房一千三百四十四间，五十五年设立衙门”。[⑦]乾隆《大清会典则例》称：“(康熙)五十五年复准，奉天旅顺口水师营，盖造官兵住房一千三百四十四。”[⑧]可见，无论是称为金州水师还是旅顺水师，房屋数量都完全一致。甚至在同一文献中，用不同的名称，但营房间数仍完全一致，如《八旗通志初集》中说：“旅顺口设立水师营，造给协领、佐领等官员并兵丁、水手房屋，于旅顺等处，支取盛京户部库银，盖造房屋，共一千三百四十四间。”[⑨]而《钦定八旗通志》虽然房间数相差了四间，但说的仍是同一座水师营盘，同一地点：“旅顺口驻防，康熙五十五年，奏准设立水师营。造给协领、佐领等官衙署共一百四十四间，兵丁、水手房屋共一千二百四间，皆坐落旅顺口北金州所属八里庄地方。”[⑩]可以确定，无论说金州水师还是旅顺水师，都是拥有一千三百四十余间房屋的同一座营盘，辽东沿海只有这一支水师，称呼不同罢了。

需要说明的是，文献也有将二者直接写为一处水师的情况，二而一,一而二，当时人大约都清楚，不论怎么称呼，都是指金州以南、旅顺以北的这一支八旗海防水师。笔者曾亲赴旅顺港口实地考察，清代旅顺旗营水师泊地并不在海上港口，而是沿龙河口上溯二三公里，泊船之地在通海的内河，既避免了海上风浪对木制战船的损害，也方便在必要时顺河而出，赴港口外巡海。而官兵居住的茅草顶石屋，距龙河泊船地又有十数分钟的车程，即文献所载之旅顺以北的

---

① 《钦定八旗通志》卷35《兵制志四》，李洵等点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610页。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182《兵考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426页。

③ 《内阁题本》，兵部尚书班第等，乾隆十年十二月初五日，档案号：02-01-006-000736-0001。

④ 《内阁题本》，兵部尚书班第等，乾隆十年十二月初五日，档案号：02-01-006-000736-0001。

⑤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37《驻防官兵操演》。

⑥ 王希智等：《大连近百年文献》，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⑦ 《八旗通志初集》卷24《营建志二》，李洵等点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53页。

⑧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27《工部营缮清吏司·营房》。

⑨ 《八旗通志初集》卷24《营建志二》，第453页。

⑩ 《钦定八旗通志》卷116《营建志五》，第1985页。

金州所属八里庄地方。

二、旅顺旗营水师建制沿革与旗籍性质

清代旅顺水师的建立，或可追溯到顺治时期。《清史稿》载："奉天旅顺口，于顺治初年设水师营，以山东赶缯船十艘隶之，始编营汛。"① 但是，《清史稿》等文献关于旅顺水师始于顺治时期的说法颇可质疑。

首先，顺治时接手的明末水师残部，难以成军。如前所述，金州之旅顺有水师驻防，始于明代抗倭战事的需要。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兵部尚书邢玠题称，"倭性极狡"，往来于朝鲜至辽东与山东一带广阔地带，"今总兵周于德既至旅顺，合将前后调集水兵，即令统领。如倭贼果入内地，则相机防剿，如仍据朝鲜，则听臣调为水陆夹击之举。量拨水兵一枝，留守旅顺"。② 此后数年，旅顺水师在抗倭战事中起到一定作用。至万历三十年倭患稍平，有撤去旅顺水师之议，经辽东巡抚赵楫奏请，留山东游击所率水师于旅顺："夫旅顺虽辽左地方，南距登州水路止八百里，倭奴入犯山海、天津，必繇此路，盈盈一水，扬帆可渡。若此兵一撤，不惟辽左可虞，即天津、山东恐亦不能安枕而卧矣。议将此游击水兵，责令驻扎旅顺，以备不虞。"③ 后来这支水师于崇祯六年（1633）为清军击败，首领黄龙被杀，溃兵残部归于清，成为《清史稿》所说金州、旅顺于顺治初期水师之由来，但此溃兵难以成军。

其次，清入关时举全国之力，倾巢而出，留守东北的兵力非常有限，当地人口也极少，直到康熙中期仍在缓慢恢复中。顺治十八年，奉天府尹奏报："盛京形势，自兴京至山海关，东西千余里。开原至金州，南北亦千余里。又有河东河西之分……合河东河西之腹里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而与水师相关的金州人口"不过数百人"。④ 人口与兵力均属不足的情况下，拥有完整海防水师的可能性较小。大多数史籍记载中，由山东登州裁减战船中调拨十只到辽东半岛，也都是在康熙五十三年。

再次，康熙末年建立旅顺水师的记载，均未提及此前该地方曾有水师。

检索清代档案及各类典章史籍，多认定旅顺水师建置时间为康熙五十二三年。康熙四十七年后，沿海海盗盛行，以致不时登陆抢劫，严重危害沿海地区安全，加强沿海治安与防御力量势在必行。同时，经康熙初年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实力增强，也具备了整饬沿海海防的条件。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在亲审投降海盗陈尚义的过程中，已经有了建立盛京水师的考虑。如果此地原有水师建制，应会考虑改建或增设，但文献中完全未曾提及。

> 朕昨阅地图，山东水师住处，未为扼要，然设立已久，不便议裁。宜于盛京上游要地，添设营船二十只。此驻防之船，即将各省水师营船，及驾船水手酌量调取，出洋巡哨，并带陈尚义等前往。海中盗贼，伊悉知之，自然渐次擒获矣。⑤

这里，建立水师的构想与实施，完全未提及旅顺原有水师。建立和加强辽东沿海水师一事，与剿灭沿海"海贼"关系密切，⑥ 康熙帝对于在盛京沿海设立水师也早有设想。同年五月，兵部就陈尚义等人的安置问题请示，康熙帝明确指出："先经拿获海贼俱已发遣宁古塔等处，现今

---

① 《清史稿》卷135《兵志六・水师》。

② 《明神宗实录》卷318，万历二十六年正月乙未。

③ 《明神宗实录》卷379，万历三十年十二月己丑。

④ 《清圣祖实录》卷2，顺治十八年三月丁巳。

⑤ 《清圣祖实录》卷254，康熙五十二年三月戊寅。

⑥ 张银龙：《清代旅顺水师营的创建——以陈尚义为中心》，《山西青年》2017年第6期；丁宁：《清代东北八旗水师研究》，长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陈尚义等一百余人又来归诚，内有熟识水性之人，将伊等归并盛京金州地方，著设立水师营。”并谕令将山东水师裁撤战船“截留数船，分往金州”。[①] 以是观之，则建立旅顺水师与安置归降“海贼”同步，似乎安置“海贼”之事在先。至康熙五十二年八月，经廷议后正式下令设立旅顺水师：

> 盛京锦州地方设立水师营，于防守海洋大有裨益。查锦州城旧有召募岛丁一千四百三十二名，今新设水师，应于岛丁内挑选四百七十名，加以发往陈尚义等谙练水性之人三十名，共兵五百名。应立协领一员，佐领二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八员，均属奉天将军统辖。[②]

清代及后世各类文献对旅顺水师营设立时间各有不同记载，雍正《盛京通志》说成立于康熙五十四年，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则有康熙五十五年一说，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记为康熙五十三、五十五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旅顺水师建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中间也有波折，如山东拨付战船老旧，很快就需要拆造换新，等等。乾隆间档案中曾对此过程中进行了概括性说明：

> 臣详查，奉天属南金州旅顺口地方，于康熙五十三年，将山东拨至战船十只，复行毁造，五十五年工成，设立水师营。[③]

《清实录》对于此次战船拆造也有记载：

> 工部议覆，署理奉天将军事前锋统领伯唐保住疏言，奉天战船年久，船底朽烂，俱不堪用，请行拆造。[④]

综合档案与《清实录》及《盛京通志》的记载，可以断定，编建旅顺水师议定于康熙五十二年，基本建成于五十三年，并开始参与海上巡防事务，但因山东拨来战船破旧不堪，不得不重新拆造，直到五十五年，水师营才稳定运营。

旅顺旗营水师建立后，长期保持了兵丁五百名、水手一百名和战船十只的配置。其中水手百名，即山东战船送到时每船配置十名的水手，“后因张可达等虽谙水性，能掌舵者止有四人，即将送船水手一并留营当差”。水师初建，缺少驾船的人员，“山东送船留营当差之水手，作为民舵，与旗兵一体关领银米”。[⑤]

乾嘉以降，旅顺旗营水师兵员略有增减。乾隆十二年，议定增兵一百名，“移金州驻防汉军兵一百名于金州水师营”。至乾隆十九年，又将所增一百名裁归旧营，并裁减战船四只，“十九年，裁金州水师营船四号，水手四十名。移水师营汉军后一百名，仍归金州驻防本营”。但是到嘉庆四年（1799），又将乾隆十九年裁撤部分重新增补回来，“嘉庆四年，复增金州水师营船四号，水手四十名。于旅顺口设立台站，仍由金州驻防移回汉军兵一百名驻防水师营”。[⑥] 咸丰元年（1851），为应对严峻的海疆局面，批准奉天增加战船四只，“仿照山东章程，添造开风船二只，广艇船二只。连炮位器械，并招募水勇，责成金州副都统，督率驾驭”。[⑦]

从建制沿革上看，旅顺八旗水师营曾有两次较大事件发生。

第一次是雍正四年夏秋间盛京将军噶尔弼提出了一项在辽东半岛沿海增设三处水师的建议。盛京辽东辽南地区，水师力量严重不足，“于此千里之间，惟有旅顺水师营”。此时由山东等地偷渡来此的流民、人参客等皆来自水道，“此皆水兵不能遍查之故”。解决之法，建议于金州、

---

① 《清圣祖实录》卷 255，康熙五十二年五月乙卯。
② 《清圣祖实录》卷 256，康熙五十二年八月甲戌。
③ 《内阁题本》，兵部尚书班第等，乾隆十年十二月初五日，档案号：02–01–006–000736–0001。
④ 《清圣祖实录》卷 260，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壬辰。
⑤ 佚名：《盛京通鉴》卷 4《兵司应办事宜》，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文海出版社，1974 年，第 154 页。
⑥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1127《八旗都统十七 · 盛京将军所属驻防兵制》。
⑦ 《清文宗实录》卷 28，咸丰元年二月丙戌。

复州之间，熊岳、盖平之间，岫岩、凤凰城之间，增设水师营三处。这实际上是沿辽东半岛海岸，以旅顺为中心，向渤海、黄海两个方向增建水师的方案。雍正帝此时正着力布置沿海八旗水师，天津、杭州、乍浦、江宁等地旗营水师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筹划或布置的，噶尔弼的这一建议当然得到雍正帝的赞许。但这一建议遭到奉天府尹尹泰的坚决反对。“据奉天府尹尹泰奏称，自山海关迤南锦州、复州、盖州地方海洋，系进登州之海口，不比大海。旅顺口现有水师营，今天津又设水师营。此二营水师，尽可轮班巡察。若又添设水师营，将来制造船只，修盖营房，以及兵饷等项，所需钱粮浩繁，究于巡察无益。”① 雍正帝令二人会商后再奏，但意见仍无法统一。最后，廷议支持尹泰的意见，即已有旅顺、天津和登州三处水师足以应对沿海防御，并可节省开支的主张。雍正帝最后俯从众议。这一场争议的结果，使旅顺及辽东半岛失去了一次发展水师的机会。②

第二次，乾隆三十三年，盛京方面顶住了大力裁撤旅顺水师战船的压力，保住了旗营水师的基本力量。乾隆中，因长期“河清海晏”等多种因素，天津八旗水师裁撤，有人提出减少沿海水师战船。事涉旅顺水师，新任将军明福态度鲜明，坚决反对裁减旅顺八旗水师的战船，奏称：“旅顺水师营情形，出口即系大洋，东至朝鲜，南通浙闽等省，西至天津，往来商船必由之咽喉要路。除乾隆十九年经军机处议奏，已裁汰战船四只外，现在仅有战船六只，每逢操演必需四只，二只镇守。况历年三只防海，三只巡海，东至凤凰城界洋河口，有九百余里；西至锦州天桥厂，有八百余里。每年遵例稽察。且奉省所属疆界岛屿远越大洋，非赶缯战船不能涉历。”③ 反复说明不能裁减战船。后朝议保留旅顺水师战船的意见占据上风。经此一议，旅顺水师得以维持基本配置。

旅顺水师的旗籍水师性质，一般并无疑问，只是通常简称为旅顺水师，较少注意到它的八旗水师性质。也有学者认定它是由“满蒙八旗子弟组成”，不确。④ 事实上，旅顺旗营水师最初的兵力主要来自于招募的盛京沿海地区的“岛丁”，多为明末清初流亡到此的流民及部分前明军人。此类人员应募入伍，并改编成为八旗汉军，与当时宽松的入旗政策相关。按学者们的研究，当时东北地区人口稀少，政策上也存在着一个“出民入旗”的趋向。⑤ 水师所在的金州地方，也有多次招民开垦和编民入旗的记载：康熙“二十年，编民入旗，置城守章。二十六年置城守尉。三十一年于满八旗外复设蒙古巴尔虎一旗，佐领一员。五十三年，编城西民户入汉军三旗。五十四年增设旅顺水师营协领”。⑥

在金州旅顺等地编民入旗的背景下，招募“岛丁”改为旗籍是必然的。“嗣奉谕旨，以壮丁皆系编入旗佐之人，岂可率为绿旗之兵，著将副、守、千、把改为协领一员，佐领二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八员，其拣选投降海盗三十名，俱著入旗，同壮丁等编为左右翼。山东送船留营当差之水手，作为民舵，与旗兵一体关领银米。至该营协领缺出，即由盛京汉军八旗佐领内拣选，如佐领等官缺出，即由本营应升之人挑放。”⑦ 旗民有别，是实实在在的政策，即便是招募流民与壮丁，在“龙兴之地”也需要编入旗籍，“岂可率为绿旗之兵”。

时金州地区按区域编入八旗汉军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有“汉三旗”之称，而水师营属汉军正白旗。这种编民入旗是历史需要与政策的产物，对巩固东北边疆防御和经济发展起到

---

① 《清世宗实录》卷 55，雍正五年闰三月丁卯。又见民国《奉天通志》卷 31《大事三十一·清五·世宗》(文字略有出入)。

② 《中国海防史》等著作以此为依据，认定雍正时期盛京增加了三处水师，有误。见杨金森等:《中国海防史》，海洋出版社，2005 年，第 421 页；吴庆洲:《中国军事建筑艺术》下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533 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盛京将军福明，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档案号：03–1082–018。

④ 王宏斌:《奉天府的内外洋与盛京水师巡洋制度》,《晋阳学刊》2020 年第 2 期。

⑤ 刘小萌:《清前期东北民人的“出民入旗”》,《民族研究》2024 年第 4 期。

⑥ 孙宝田:《旅大文献征存》卷 1《文一》，抄本，第 3 页。

⑦ 佚名:《盛京通鉴》卷 4《兵司应办事宜》，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154 页。

正面作用。如学者评论的："散布在沿海诸岛的'岛丁'曾构成汉军佐领的重要来源。岛丁多掌握军事技能，长期据守海岛，从事农耕狩猎，栉风沐雨，含辛茹苦，养成强健的体魄，彪悍的作风。清官府将其招抚为兵，一则充实了八旗军力，二则消弭了治安隐患，三则发展了辽东经济，可谓一举三得。"①

简言之，旅顺八旗水师正式组建于康熙五十二、五十三年间，至五十五年后始正常运行，成为辽东沿海最重要的海防力量。旅顺旗营水师建立发展中，屡遇波折与变化，雍正初曾有增设之议，乾隆中有大力裁减战船之说，均遭否决。从兵员性质与组织、管理体系来看，旅顺水师的旗籍性质是肯定无疑的。

三、旅顺八旗水师巡防路线、制度与作用

旅顺旗营水师甫一设立，即成为北方巡防内海外洋的基本力量。

康熙五十年，盛京将军针对盛京沿海及渤海入口处的海防空缺，奏请由山东水师跨海巡防："请令山东之防海水师官兵，巡哨到锦州铁山。"② 铁山位于旅顺湾南侧海滨，这一要求体现出渤海地区尤其是辽东方面对海防巡哨的迫切需求。康熙五十二年，在设立旅顺水师的谕旨中，也引用山东总兵李雄的说法，认为于盛京金州方面设立水师，"看守地方，巡防海洋，似有裨益"。③ 显示设立盛京所属水师，初始目的之一即是"巡防海洋"，有填补渤海入口处的海防空白战略意图。

一般认为，旅顺水师在道光中期以前的巡哨路线仅限于盛京沿海，并不跨海与山东会哨。④然以实录所载，旅顺水师甫一设立，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即与山东划定分巡界线，分别巡哨：

> 今盛京与山东各有战船十只，水师营官兵，嗣后盛京所属地方应令盛京将军拨水师营官兵巡查，山东所属地方应令山东总兵官拨水师营官兵巡查。查铁山与隍城岛，中间相隔一百八十余里，其中并无泊船之所，恐有小盗往来行走，亦未可定。应交与盛京将军、山东总兵官，自铁山起九十里之内令盛京官兵巡哨，自隍城岛起九十里之内令山东官兵巡哨。并令盛京将军、山东总兵官定为界限。从之。⑤

可见，旅顺水师甫一成立，即与山东水师划分界线，承担海防巡查任务。此外，旅顺水师另有两条巡哨路线，一是向渤海方向，西至锦州天桥厂；二是黄海方向，至凤凰城、岫岩海滨。"西至天桥厂巡查，其船到船回日期，令金州海口守汛放卡各官详报。向凤凰城巡查之时，令该城守尉详报。所有巡防事宜，务令水师官兵等，倍加严密。"⑥

旅顺水师在上述三条正常巡洋线路之外，特殊情况下，为追捕海盗，也时有跨界进入朝鲜巡哨。因此雍正间即有增设中朝边境水汛的提议。直到嘉庆时期，时有旅顺水师巡查时追捕逃犯进入朝鲜的记载。嘉庆三年"奉天旅顺水师营防御骁骑校蒋世魁，奉文乘坐战船，到獐子岛缉拿贼匪。九月初二日，在苇塘内拿贼匪一名刘青山，又于芦塘水边拿获贼匪一名蔡法，协同朝鲜缉拿云。""副都统派送兵役，则沈阳协领恒福、水师营章京恒庆去月二十一日以后，从海

---

① 刘小萌：《清前期东北民人的"出民入旗"》，《民族研究》2024年第4期。

② 《清圣祖实录》卷245，康熙五十年二月戊寅。

③ 《清圣祖实录》卷255，康熙五十二年五月乙卯。

④ 江红春：《清代旅顺水师营初探》，《大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大连通史》编纂委员会：《大连通史（古代卷）》，第538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261，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壬寅。

⑥ 《清高宗实录》卷276，乾隆十一年十月丙子。

路鳞次出去。前后所捉贼匪百余名，已为押送于副都统所在处。而水师营官员及岫岩官员之前后出去者，不知几辈云。”[①] 从巡哨的角度看，旅顺水师直到嘉庆时期，仍能自由出入中朝边界之海岛，朝鲜方面得到消息后也会尽力配合。从海防角度看，跨境巡防仍是针对小股海贼，即文中所称的贼匪之流。此次的巡防，与岫岩防守尉方面互相配合，朝鲜方面得知情况后，也配合并参与了缉捕活动。以朝方李朝实录记载看，旅顺水师进入其境抓捕逃犯与海贼的情况，并不鲜见。从这一事例观察，旅顺旗营水师巡防是包括了中朝之间海域的，也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跨国巡洋的海上力量。

然而，专制时代的国家政策缺乏长期稳定性，长期的“河清海晏”也使内河外海的水师与陆路军队一样，陷入将惰兵疲的局面。就旅顺水师而言，其间经历了两个较为重要的历史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乾隆十年，奉天将军达尔当阿（实录称达勒当阿，又有称达尔党阿）题请全面整顿旅顺旗营水师，完善水师相关制度。当时，旅顺旗营水师已历三十余年，旧有官兵已多半退休，新任官兵训练不足，船只修造跟不上需要，各种制度弊端也已显现。虽然海防沿线未出现较大战事，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水师的状态已然不能满足海防需要。达尔当阿的题本缕述了旅顺水师营的现状，提出了改弦更张的一系列举措，包括海洋会巡之例，水师营各级官员的铨选与补放，水师战船改变停泊港口，照天津八旗水师之例添设教习官兵，将军、副都统巡查“操验”水师的制度，等等。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检索到兵部对达尔当阿这份奏疏的议覆，汉文部分即长达 50 多页（满汉文字合计 200 多页），亦可见其议论事项之多。很多事项得到兵部的肯定，并得到乾隆帝的批准，如水师营兵加强训练、官员铨选事项等，尤其是主管水师营的上级主官，定期检阅和视察旅顺水师，察其状况，定其奖惩等项，一直为后世所坚持，直到晚清的同、光时期，档案中仍能见到此类视察的报告。乾隆十年达尔当阿的这份题本，是旅顺水师营历史上的标志性文件。巡哨成为有具体制度、有监管的日常军事活动。官员拔补与兵丁训练也都形成了相应的制度性规章，并为后世所沿续。[②]

第二个节点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清朝将熊岳副都统移驻金州，并制定新的规制。为应对英、法等国舰队在沿海游弋的威胁，“议准，金州洋面紧要，移熊岳副都统、协领改驻金州。熊岳原额兵九百五十名，即由该副都统酌调，并可就近校阅水师营。其金州城守尉移扎盖州，盖州防守尉移扎熊岳。统归金州副都统兼辖”。[③] 金州副都统全称“管理奉天金州等处副都统”，隶盛京将军，下辖金州、盖州、复州、熊岳诸地旗兵，管理旗民与军政要务，成为辽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军政机构。这是旅顺旗营水师在军政体系上的一次重大调整。同时，海防善后中，对旅顺水师相关制度进行调整。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奉天与天津、山东海防联动。“奉天、山东原有会哨之例，现在直隶既有巡哨兵船，则三省洋面连为一气，于巡查哨探，自可益形周密。著禧恩、托浑布严饬该弁兵等，酌定日期，会同直隶巡洋兵弁，一体梭查。傥有洋匪窃发，果能于出洋会哨之时，捡捕击获，准予加等鼓励。其有畏怯风涛，仅知泊船近洋，不能驾船远探者，一经查出，即行严加惩处。务使稽查得力，洋面肃清，是为至要。”[④]

道光时期这一次整顿与改制，是乾隆十年旅顺水师定制近百年后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与乾隆十年的安排相似之处在于，它也有非常具体的水师巡防海洋的制度性安排。“将水师营额设战船十只内，每年拨派六只，每船派兵丁水手六十名，分为三路，派官三员，带领巡洋。南至山东交界之隍城岛以北地方，赴山东登州镇衙门呈验照票。东至岫岩大孤山与朝鲜交界处所，由岫岩城守尉查验票照。西至锦州洋面与直隶交界之天桥厂，赴锦州副都统衙门呈验票照。以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中华书局，1980 年，第 5048 页。

② 《内阁题本》，兵部尚书班第等，乾隆十年十二月初五日，档案号：02-01-006-000736-0001。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544《兵部三・盛京等处驻防》。

④ 《清宣宗实录》卷 384，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己酉。亦见民国《奉天通志》卷 31《大事三十一・清五・世宗》。

杜弊混。每年将验过船只造册报将军衙门查核。如船只应行修造，不敷派拨，暂雇商船，配搭出洋，改期三月出哨，九月归次。”① 而一直拖延不决的与天津水师会哨，也于道光时期强制性地出台了具体规定：“二十三年，令天津水师营每年拨战船六艘，分三路巡防，与奉天、山东师船定期会哨，以登州、岫岩城、锦州三处为呈票考验之地。有畏避风浪、巡哨贻误者，严惩之。”② 虽然此时天津水师已不比雍乾时期的规模宏大，但它与旅顺水师配合巡防，仍然是加强渤海海防的举措。对于旅顺水师而言，与邻省的配合，对于出洋所到地区的监管，均有明确制度。这些试图使颓败已久的旅顺等地水师有所振作的举措，短时期内似乎也起到一定作用。但此次改革与调整很快偃旗息鼓，归于失败。咸丰十一年初，盛京方面报告，水师巡船严重不足，“请仍归旧制”，朝廷即谕令：“所有奉天水师营巡哨战船，著仍归旧制，以战船三只巡哨，其余战船俱令守口，以节经费。”③ 道光时对旅顺水师制度的增补与改良至此失败。

旅顺水师的巡防，填补了辽东半岛向渤海与东海方向的海防空白，极大地保障了沿海安全。其与山东方面的会哨巡防，对渤海海域构成一道安保屏障。清人蓝鼎元评价说：“盛京一带澳岸，向来为洋盗避风之所，今旅顺口水师，足资弹压。”④ 配合雍正时期内地与东南沿海地区八旗水师的不断设立与发展，如天津等地旗营水师的建立等，环渤海区域在帆船时代呈现多地配合强化海防的局面。

有海外学者将这种局面称为“渤海的海洋军事化”。⑤ 对帆船时代加强海防的举措冠以“海洋军事化”的概念，似有言过其实之嫌。但清廷构建环渤海的防御体系的动机也是其来有自，它至少基于三个层面的动因。其一，如同吉林、黑龙江等地水师产生于抗击沙俄侵略的紧迫需要一样，旅顺水师的建立，也与东北地区的海防压力密切相关。一方面，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皇俄国并没有停止侵略东亚的步伐，圣祖三十六年左右，他们一面出兵北堪察加地区，一面又向南面的清朝屡派使节。综上，我们当然不应将沙皇俄国侵略从设立旅顺水师营的理由中剔除出去”。⑥ 另一方面，日本对华侵略的影响也不亚于沙俄。旅顺水师巡哨之地，即为明代“倭寇”猖獗之地，明代军民抗倭的“望海埚”之战，即发生于巡防点上。“明代的‘倭患’经历留下了持续的‘倭寇’记忆，并对明清时期的海权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中后期以迄清中期的海防论述多以“倭寇”为假想敌，以“备倭防寇”为着眼点，清前期的海防实践也不免打上抗倭的印迹。⑦ 其二，明清鼎革之际，清与明军曾在辽东沿海的皮岛等处发生激战，清军险胜但损伤惨重，“自此以后，盛清一代对渤海的管理大多一丝不苟，没有太大意的松懈”。⑧ 其三，清入关后，自康熙时代起，对所谓“龙兴之地”的重视不断强化，偷渡与偷挖人参的活动，均为朝廷特别关注的大事，加强海上防范当是渤海海防题中应有之意。“渤海水域的战略性，在盛清一代依然举足轻重，即便在所谓太平无事的盛世，我们原则上也可以看到清廷并没有忽略东北一带的海上布防。‘建威消萌，有备无患，时刻稽察留心’，大概就是康雍乾三代，筹海方略的基本面相和构想。”⑨

自康熙末年正式建立，直到光绪初年裁撤，旅顺八旗水师内卫渤海，与天津水师相对；外巡东海，远达朝鲜等地；南瞰渤海海峡，与山东登州水师呼应，成为盛京沿海主要海防力量。

---

① 佚名：《盛京通鉴》卷 4《兵司应办事宜》，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155 页。

② 《清史稿》卷 138《兵志九 · 海防》。

③ 《清文宗实录》卷 342，咸丰十一年二月壬戌。

④ 蓝鼎元：《论海洋弭盗贼书》，《皇朝经世文编》卷 85《兵政十六 · 海防下》。

⑤ 布琮任：《海不扬波：清代中国与亚洲海洋》，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第 132 页。

⑥ 井贯军二：《水师营史考》，第 70 页。

⑦ 李恭忠：《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江海学刊》2007 年第 3 期。

⑧ 布琮任：《海不扬波：清代中国与亚洲海洋》，第 111 页。

⑨ 布琮任：《海不扬波：清代中国与亚洲海洋》，第 132 页。

四、余论

旅顺八旗水师特征明显，与东南沿海各地的旗营水师有着较大区别。首先，旅顺水师是兼巡内外洋面的内外海洋水师。与天津、山东等地水师会哨，是旅顺八旗水师主要职司，是它区别于直省各地八旗水师的特色。“盛京金州水师旗营员弁有旗界地方之责，所管汛地洋面，巡哨章程，与绿营同。至浙江乍浦、广州、福州各处驻防水师，专事操防，向无巡洋缉捕之责。”① 而从巡洋及管理体制来看，它与各地旗营一致而有别于绿营水师，“凡巡防之制，外海巡防，盛京以协领为总巡，佐领、防御、骁骑校为分巡。直省以总兵官为总巡，副将以下为分巡。各于所治界内率舟师沿海上下更番往来，以诘奸禁暴。两界相交之所，届期会哨。同时联名申报将军、总督、提督察核，委官稽查。若因风汛阻滞，或先或后，各以到界之日申报。其期约以二、四、五月为始，至九月事竣回营。其有引避不巡及巡有不周者，论如军律”。②

其次，在旅顺旗营水师巡防区域如发生海盗与各类案件，它须负责任并按制惩处。如咸丰四年，金州所属羊头洼口外等处发生“贼船”抢劫商船事件，廷议除将守汛佐领、防御等人革职处理外，“水师营巡船，缉捕贼匪是其专责。该总巡佐领韩兆凤、协巡防御韩广兴，未能及时追缉，亦难辞咎，均著交部严加议处”。③ 而南方旗营水师则鲜有这方面的责任或者规避了这类惩处。

再次，东北驻防旗人普遍拥有土地，旅顺水师也不例外。金州界内“水师营地二十六顷十八亩”。④ 清廷设置水师营，占用营区及周边大片土地为随缺地。咸丰三年旅顺水师营“营务须知”规定：“水师营 500 名领催和士兵由清廷拨给官地和房屋地，对协领、佐领、防御和骁骑校等官员，按职级分别拨给土地 300 亩、240 亩、210 亩、180 亩，解决其粮饲和食宿。” ⑤ 文献中也有关于他们得到“接济银”和“牛具银”的记载：“金州，原领接济银一千五百四十八两，牛具银一千九百六十八两。”“水师营，原领接济银八百六十二两，牛具银一千四百七十六两。”⑥ 可见官兵拥有土地的情况。

此外，更重要的在于，旅顺八旗水师的建立与发展，与清前期建构海疆防御体系的努力相关。旅顺水师营从一开始就是清代海防的重要环节，它是八旗水师在中国东部沿海的起点。由此而下，从北到南，天津、京口、江宁、杭州、乍浦直到东南地区的福州和广州，各地的八旗水师与陆上八旗驻防互为犄角，相互依托，呼吸与共，组成清代海防最靠海岸线的一条纵向防线。各地八旗水师全员存在的时间或许很短，如天津八旗水师前后不过存在了四十余年，但它们却是清代“首崇满洲”和国语骑射政策的真实体现，是八旗驻防体系向海防的延伸。而旅顺旗营水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这一环线上重要一节，不可或缺。八旗水师是八旗驻防制度在海疆的延伸，是贯穿整个清代社会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实践，在海防领域也不例外。从环渤海防御圈来看，旅顺水师兼巡内洋与外洋，甚至成为跨国巡防的海上力量，成为清前期环渤海军事与海防积极发展的一个表征。当它与天津和山东登州水师互相关联起来时，渤海等地的海面就成了有防之海而非人们所说的“有海无防”。以鸦片战争失败，用蒸汽时代钢铁巨舰的角度去看待清前期的布防，认为它“作用不大”，无足轻重，是一种以今人眼光苛求于古人的

---

① 《清宣宗实录》卷 172，道光十八年八月己亥。

② 《钦定八旗通志》卷 38《兵制志七附巡防》，第 685 页。

③ 《清文宗实录》卷 138，咸丰四年闰七月己巳。

④ 《钦定八旗通志》卷 71《土田志十》，第 1263 页。

⑤ 水师营街道志编委会：《水师营街道志》，第 188 页。

⑥ 佚名：《盛京通鉴》卷 3《恩赏银库应办事宜》，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第 114 页。

做法。

旅顺八旗水师从康熙晚期进入国家海防序列，几乎与清王朝的海防相始终，是清代八旗与海防研究的重要课题。它的称呼复杂，巡防海域宽阔，一直是渤海与东海交界海域引人瞩目的力量。但在长期的制度性腐败侵蚀之下，初期锐意进取的旅顺水师，也与整个八旗驻防制度一同陷于颓败与沉沦。其失败与消亡原因，同样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References

Yang Jinsen, Fan Zhongyi. *Zhongguo haifang shi* (A history of China’s coastal defence). Beijing: Haiyang chubanshe, 2005.

Wang Hongbin. “Fengtianfu de neiwaiyang yu Shengjing shuishi xunyang zhidu” (Internal and external waters in Fengtian Office and Shengjing marine patrol system). *Jinyang xuekan* (Academic Journal of Jinyang) 2 (2020).

An Examination of the Lüshun Eight Banners Navy in the Qing Dynasty

PAN Hongga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bei University; Hubei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anhg77@qq.com)

Abstract: The Lüshun Eight Banners Naval Navy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naval forces in the Qing Dynasty, established to meet the needs of coastal defense and control the strategic choke point of the Bohai Strait. Its name is often misinterpreted, sometimes confused with two separate naval forces in Jinzhou and Lüshun. Based on its troop composition and the Eight Banners administrative system, it undoubtedly belonged to the Eight Banners naval forces. Proposals to increase troops in the early Yongzheng period and to reduce troops in the mid-Qianlong period were both rejected. The camp system was reformed in the tenth year of Qianlong and the twenty-third year of Daoguang. It was responsible for both inland sea patrols and offshore patrols, even extending to cross-border patrols to Korea. It collaborated with the Tianjin and Shandong Dengzhou naval navies to build a defense system around the Bohai Sea,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the coastal defense and the Eight Banners naval defense system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Eight Banners naval navy was a natural extension of the Eight Banners garrison system to the coastal areas. Its rise and fall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coastal defense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Eight Banners and naval defense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Qing Dynasty, Lüshun, Garrisoning Banners, Eight Banners Naval Navy